

编者絮语：

列维纳斯、德里达与布朗肖： 历史沉默深处，或历史之外的见证^{*}

汪海

书写的人无法撇开艰难的职责。确切地说，今天，书写者应该服务的不是历史的制造者，而是历史的承受者。

——加缪，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晚宴致辞^①

书写，当然，就意味着放弃，放弃联系，放弃姓名，同时又不是放弃，而是宣告，欢迎那不在场的，却又意识不到那不在场者——或者，通过文字，在文字内含的缺席中，书写成为与无法记忆之物的联系，成为对不可感受之物的见证。

——布朗肖，《灾异的书写》^②

^{*}本文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世俗时代的解构主义宗教观研究”（项目编号17BZJ010）的资助。[This paper is a result of the research project “Deconstructive Understanding of Religion in the Post Secular Era” fund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Project No. 17BZJ010).]

^① Albert Camus, “Banquet speech,” NobelPrize.org. Nobel Prize Outreach AB 2022, Sun. 13 Feb 2022,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terature/1957/camus/25232-albert-camus-banquet-speech-1957/>.

^② Maurice Blanchot, *L'Écriture du Désastre* (Paris: Gallimard, 1980), 186.

20世纪90年代,美国比较文学学者菲尔曼(Shoshana Felman, 1942-)和法国历史学家维韦约卡(Annette Wieviorka, 1948-)相继提出,自二战结束尤其犹太人屠杀的真相被披露后,我们已进入“见证的时代”(英: the age of testimony, 法: l'ère du témoin),“见证已然成为我们与时代事件之间至关重要的关联方式”^①。从口述史的兴起,纪录片的繁荣,再到以见证为主题的哲学探讨,^②甚至于今天自媒体的涌现,或许可以说,“见证”的确已经成为当代思想文化的关键词。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种被称为“见证文学”(英: witness literature, literature of testimony; 法: littérature de témoignage)的新型文类应运而生。^③大屠杀幸存者犹太裔罗马尼亚—美国作家维瑟尔(Elie Wiesel, 1928-2016)高度评价:“如果说古希腊人发明了悲剧,罗马人发明了书信体,文艺复兴发明了十四行诗,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则

^① Shoshana Felman and Dori Laub, *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5. Annette Wieviorka, *L'Ère du Témoin* (Paris: Plon, 1998).

^② 许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当代思想家比如列维纳斯、布朗肖、德里达、利科和冈本等都讨论过见证问题,其中的代表性作品有: Emmanuel Levinas, “Truth of Disclosure and Truth of Testimony,” in *Emmanuel Levinas: Basic Philosophical Writings*, eds. Adriaan Theodoor Peperzak, Simon Critchley, Robert Bernasconi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97-107; Emmanuel Levinas, *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 (La Haye: Martinus Nijhoff, 1974); Emmanuel Levinas, *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 trans. Alphonso Lingis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98); Maurice Blanchot, *L'Écriture du Désastre*; Jacques Derrida, *Demeure: Maurice Blanchot* (Paris: Galilée, 1996); Jacques Derrida, *Demeure: Fiction and Testimony*, trans. Elizabeth Rottenber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Jacques Derrida, “‘A Self-Unsealing Poetic Text’: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Witnessing,” trans. Rachel Bowlby, in *Revenge of the Aesthetic*, ed. Michael P. Clar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0), 180-207; Giorgio Agamben, *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 trans. Daniel Heller-Roazen (New York: Zone Books, 1999); Paul Ricoeur, “The Hermeneutics of Testimony,” trans. David Steward and Charles E. Reagan, in *Essays on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80), 78-101; Paul Ricoeur, *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 trans. Kathleen Blamey and David Pellau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③ 参见李金佳:“译序”,载克洛德·穆沙:《谁,在我呼喊时:20世纪的见证文学》,李金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3页。[LI Jinjia, “Preface to Translation,” in Cloud Mouchard, *Who if I Cried Out: The Twentieth Century Witness Literature*, trans. LI Jinjia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5), 1-13.]

编者絮语：列维纳斯、德里达与布朗肖：
历史沉默深处，或历史之外的见证

发明了见证文学。”^①

然而，见证与文学之间“先天”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根据《汉语大词典》，见证有两个义项，一是“证明、证据”，主要作名词；二是“亲眼目睹可以作证。亦指见证人”，既可作动词，也可作名词。^②英语学界在讨论“见证文学”时，用的是“witness”或“testimony”。这两个词汇都是法律术语，作名词时都与“证明、证据”相关。“witness”指提供证据的“见证者或证人”，“testimony”则指作为证据的“证言或证词”。见证者的特点是，他必须曾经“见证”（“witness”作动词）某一事件，即亲身经历某事件，当场看到、听到或感知到这一事件。如果事后他在法庭公开讲出他的亲历，作为审判的证据，他就成了证人。此外，见证一词还具有很强的宗教意涵，指信仰者通过自身的言语或行动为信仰提供证明。^③

显然，见证追求再现事实真相，文学则重在想象虚构，而虚构是证言的大忌。这一矛盾从见证文学诞生之初，就一直困扰着创作者们。

见证文学的困境

维瑟尔在一场题为《作为文学灵感的犹太人大屠杀》的演讲中，自我诘问道：“我们怎么可能去写一部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小说呢？【作为写作者】我怎么可能不去体认我笔下场景中的每个人物？【可是】我又怎么可能体认那么多受害者？更糟的是，我怎么能够体认行凶者？一个受害者怎么能够体认杀害他的凶手？”见证要求书作者忠实于自身的感受与经历，而文学却要求书作者忠实于笔下所有人的立场，甚至要与凶手“感同身受”，但

^① Elie Wiesel, “The Holocaust as a Literary Inspiration,” in *Dimensions of the Holocaust*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7), 9.

^② 《汉语大词典》（第十卷），词条“见证”，罗竹风编，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年。[“jian zheng,” s.v., in *Han yu da ci dian*, ed. LUO Zhufeng (Shanghai: Chinese Dictionary Publishing House), 1992.]

^③ 以上对testimony和witness的义项讨论，可参见牛津在线英语大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https://www.oed.com/>；柯林斯在线英语词典<https://www.collinsdictionary.com/>；剑桥在线英语词典<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

是，替那么多沉默的受害者发声难道不是一种僭越，作伪证？替凶手发声难道不是一种背叛？

维瑟尔进而对文学本身发出终极拷问：“我们怎么能够说服自己，可以毫无罪恶感的，将这些事件的讲述用于文学的目的？那会不会意味着特雷布林卡（Treblinka）、贝乌热茨（Belzec）、波纳尔（Ponar）、娘子谷（Babi Yar）最终不过是幻想，是文字，是美，这些都不过是一个文学的问题？”^①换言之，如果见证只是为了利用苦难，去满足艺术上对于审美愉悦的追求，那么见证文学将不仅摧毁见证，也将是不道德的。

另一位作家给出了不同的回答。^②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犹太裔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Kertész Imre, 1929-2016）在日记体小说《船夫日记》（*Gályanapló*）中表示：“集中营，只有作为文学文本才是可以想象的，而不是作为现实。（哪怕人们亲身经历的时候，它也是不可想象的，或许尤其是在经历它的时候。）……只要我想构思一部新的小说，总会想到奥斯维辛。……即便我所讲的（从表面上看）完全是另一回事，但实际上讲的还是奥斯维辛。”^③不同于维瑟尔，凯尔泰斯对自己在集中营里的亲身经历，一直坚持用小说虚构去“创造”，而不是通过回忆录讲述。对他来说，小说虚构成为谈论那不可理解、不可想象的真相的几乎唯一的方式。虚构采访录《K档案》（*K. dosszié*）里，他一人饰两角，对自己的大屠杀小说做出解释：“【问：】在我看起来，回忆也是对世界的一部分的重建。【答：】但它不会

^① 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和贝乌热茨（Belzec）为纳粹德国在波兰设立的两个犹太人灭绝营，波纳里（Ponar）在今天的立陶宛，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党卫队、别动队和立陶宛合作者在这里对以犹太人为主的约10万人进行了大屠杀，娘子谷（Babi Yar）在今天的乌克兰，德国占领期间约10-15万人遭到屠杀。Elie Wiesel, “The Holocaust as a Literary Inspiration,” 7.

^② 这里对维瑟尔、凯尔泰斯的分析受到该论文的启发：Michael Bachmann, “Life, Writing, and Problems of Genre in Elie Wiesel and Imre Kertész,” *Rocky Mountain Review* 63, no.1 (Spring, 2009): 79-88.

^③ Kertész Imre, *Journal de Galère* [epub], traduit du hongrois par Natalia Zaremba-Huzsvai et Charles Zaremba (Paris: Actes Sud, 2010), III, para. 5; I, 1973 Août, para. 4.中文版参见凯尔泰斯·伊姆雷：《船夫日记》，余泽民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66页，第29页。[Kertész Imre, *Chuan fu ri ji* (Galley Diary), trans. YU Zemin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5), 266, 29.]

编者絮语：列维纳斯、德里达与布朗肖：
历史沉默深处，或历史之外的见证

越过这一部分的边界；而小说却会。……【问：】但是你不可能说你创造了奥斯维辛吧？【答：】在某种意义上，情况的确如此。在小说中我不得不创造奥斯维辛，赋予它生命：我不可能依赖外在的东西，那些小说之外的所谓历史事实。一切都必须在内部产生，通过语言和构思的魔力。”^①

凯尔泰斯这番话的“耸动性”在于，它挑战了传统观念里历史书写在见证真相时的至高地位。他认为，只有文学想象才能揭示奥斯维辛不可想象的真相，只有文学虚构才能维系这一真相的生命活力，建立它与现在以及未来的联系，保证它与所有人的相关性，而不会变成“死去的记忆、遥远的历史”^②。

学者们对见证文学内在的逻辑矛盾也展开了探讨。比较重要的成果有菲尔曼、劳布（Dori Laub）合著的《证言：文学、精神分析与历史中的见证危机》，布鲁姆（Harold Bloom）主编的《大屠杀文学》，斯帕戈（R. Clifton Spargo）主编的《再现之后：大屠杀、文学与文化》，洛特（Jakob Lothe）等人主编的《证言之后：面向未来的大屠杀叙事的伦理与美学》等等。^③其中菲尔曼、劳布的著作以加缪的作品《鼠疫》和《堕落》为例，对文学在见证历史危机，尤其犹太人大屠杀问题上的独特价值，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理论分析，与凯尔泰斯的观点有很多共鸣之处。

菲尔曼认为，在见证问题上，文学可以发挥两个层面的作用。第一，文学辅助历史见证。文学凭借虚构制造历史的现场感，通过激发读者的想象，带读者重新体察历史，使他们成为新的见证者，参与历史记忆的传承。^④第

^① Kertész Imre, *Dossier K* [epub], trans. Tim Wilkinson (Brooklyn: Melville House, 2013), 4%, para. 10-13.

^② Kertész Imre, *Dossier K*, 50%, para. 2.

^③ 参见Harold Bloom, ed., *Literature of the Holocaust*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2004); R. Clifton Spargo and Robert M. Ehrenreich, eds., *After Representation?: The Holocaust, Literature, and Culture*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0); Jakob Lothe, Susan Rubin Suleiman and James Phelan, eds., *After Testimony: The Ethics and Aesthetics of Holocaust Narrative for the Future*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④ Shoshana Felman, “Camus’ *The Plague*, or a Monument to Witnessing,” in *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108.

二，文学不再致力于激活历史，而是见证历史在面对犹太人大屠杀事件时遭遇的根本危机，见证历史的无力见证，讲述历史的无力讲述，从而唤起读者“响应的责任与能力（response-ability）”^①。

受菲尔曼启发，但又不同于她，本文将提出，不仅是见证文学或大屠杀文学，文学在本体意义上都具有见证的维度，这一见证发生于历史之外，或者说在历史沉默的深处。20世纪法国思想家列维纳斯、布朗肖和德里达，彼此之间相互启发、影响，^②都探讨过见证问题，尤其后两者深入考察了文学与见证的关系，因而成为本文依赖的主要思想资源。本文将先借助列维纳斯对传统历史观的反思批判，说明“历史之外”的准确含义，然后通过德里达阐述见证与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最终在布朗肖对文学与遗忘之间关系的探讨中，说明文学如何在历史之外见证无法记忆之物的无法记忆，以及这一见证如何成为与无法记忆之物的唯一关联。

列维纳斯对历史的批判

历史见证的沉默处恰是文学见证的开始。然而什么是历史？利科（Paul Ricoeur）指出，历史这个概念其实一直包含彼此纠缠的双重意涵。一方面，历史指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另一方面，历史也指对过去所发生事件的记述。^③问题是，我们不可能真的进入过去，我们触及的永远只能是对过去的叙述，而且仅仅是对部分过去的叙述。因为所有的历史叙述都必然有所取舍，取舍自然包含价值判断，^④甚至可以说是审判，什么重要值得被记住，什么微不足道可以被省略。换言之，历史的记忆同时总是意味着历史的遗忘。

显然，历史书写总是倾向于把焦点放在影响重大、不同寻常的人物和事

^① Shoshama Felman, “Camus’ *The Fall*, or, the Betrayal of the Witness,” in *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200-203.

^② 参见Barry Stocker, ed.,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Jacques Derrida: Basic Writings*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3-4.

^③ Paul Ricoeur, “Can Fictional Narratives be True?” in *Analecta Husserliana*, Vol. XIV, ed. Anna-Teresa Tymieniecka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3.

^④ *Ibid.*, 15-16.

编者絮语：列维纳斯、德里达与布朗肖：
历史沉默深处，或历史之外的见证

件之上，普通人和日常生活难以以个体形式有名有姓地出现在历史的讲述中，似乎只有灾难、骚乱、骇人的罪行等极端情况的黑暗之光才会偶尔照亮他们。^①

法国当代历史学家科尔班（Alain Corbin, 1936-）在一部实验性的历史著作《重新发现路易-弗朗索瓦·皮纳戈，论一个无名者的踪迹（1798-1876）》中，试图借助一定程度的文学虚构，抵抗历史的沉默，或者用他的话说，“稍稍弥补因为历史学家们的疏忽而造成的无可挽回的遗忘”^②。他从地方档案中随机选取了一个从未出现在任何历史叙述中的普通人，“一个作为个体已经消失的人”，然后，根据可验证的档案记录、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对他的一生进行了推测、假设和想象。^③科尔班对撰写这部“推测历史”（speculative history）著作的确切目的给出了两个说明。第一个蕴含着他的伦理关切。他借用宗教话语，将自己的实验比作是对“被吞没和抹除者”的“复活”，是对“一切终将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反抗。这种生命的虚无感，在非常亲近的人离世时，尤其令我们痛苦不安，宗教因此构想出一种理想的历史模式——在最后审判中每个人的过去都将被完整复现。第二个答案回到了历史层面：为“进入19世纪”“了解那一时期”打开一个隐秘的通道。^④然而纵观全书，我们发现这部“微观历史”（microhistory）的可敬尝试，实际上书写的还是研究对象身处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历史，而不是皮纳戈这个人。这个虽然平庸但在根本上不可替代的个体，仍然是不可见的，更没有复活。这不是科尔班的失败，而是以事实为原则的历史话语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事实话语的无能，或者说事实话语必然导致的遮蔽和压抑，在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节》中有更加尖锐的体现。作者设想了一个只允许事实话语存在的“乌托邦”——焦煤镇，它的信条是：“事实上你们看不见的东西，是

^① Alain Corbin, *Le Monde Retrouvé de Louis-François Pinagot, sur les Traces d'un Inconnu (1798-1876)* (Paris: Flammarion, 1998), 8.

^② Ibid., 10.

^③ Ibid., 11, 8.

^④ Ibid., 9, 16.

哪儿也看不见的；事实上没有的东西，是哪儿也不会有的。”^①然而，数学不好的“笨”女孩西丝却在事实话语的严密中听出了裂缝和缺失，意味深长地说统计学（statistics）总是让她想起“口吃”（stutterings）。当老师问她：“有十万人出海远航，其中只有五百人遇难淹死或烧死，那么这个百分比是多少？”西丝回答：“那就什么都没有了（nothing）。对死者的亲人、朋友来说，什么都没有了。”^②西丝没有被事实话语的逻辑所绑架，她顽固地坚持了已经被事实话语掩盖的东西——死亡的绝对不可数，坚持了“客观中立”的全知视角已经抹除的东西——生命根本的相互关联性（表现为亲人、朋友等等）。或者用列维纳斯的话说，事实话语无法见证主体在面对他者时所亲历的他者的无限性（infinity）和邻近性（proximity）。

列维纳斯对历史思维尤其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观进行了批判性反思。他认为，历史话语的问题在于它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同一化和总体化，^③具体原因与表现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从时间层面看，历史书致力于讲述过去，而这一讲述也就在同时将过去的人和事呈现为可以被语言呈现，且可以在现在被语言重新呈现的东西。换言之，历史书写是在将过去拉到与书写的当下保持着连续性的同一个时间平面内，过去与现在变成了共时（synchrony）关系，即过去被同一化为了现在。^④列维纳斯认为，时间其实产生于主体之间，来自自我与他者的相遇，^⑤而历史话语共时化的、同质化的线性时间简化了这一原初的时间经验，不仅遮蔽了时间中原本包含的“裂缝和意外”，也抹除了时间流逝一去不返、无法复原的维度，那是从未被呈现、也无法被呈现的过去，是“某种无法追忆

^① Charles Dickens, *Hard Times* (Boston: Estes & Lauriat, 1890), 7-8. 中文版参见狄更斯:《艰难时世》，全增嘏、胡文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8页。

^② Charles Dickens, *Hard Times*, 76.

^③ Emmanuel 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trans. Alphonso Lingi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79), 40, 55.

^④ Emmanuel Levinas, *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 trans. Alphonso Lingis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98), 5.

^⑤ Emmanuel Levinas, *God, Death, and Time*, trans. Bettina Bergo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11.

的、前历史的东西”^①。

从视角层面看，历史叙述通常采用非人格化的或者说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以保持与叙述对象之间的距离，突出叙述立场的客观中立性。然而，“客观性”所要求的置身事外的距离，或者自我在面对客体时的隐遁，其实正如观看所必需的距离一样，反而使自我能够更好地把握和占有客体。^②这是可被主体利用的距离，而非主体与他者之间不可把控的绝对间距。非人格化视角的背后隐藏着自我中心意识（egology），“意识在观看中逃离自身，最终又返回自身”^③，最终“所有他异性都被吸纳到自我的同一性当中……在知识中，他者变成了自我的所属物”^④。在“我”的冷眼旁观中，“我”将“满足于有限者，而不再关切无限者”^⑤。在“我”的抽身而出中，他者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与“我”相遇因此“我”必须响应的带有超验性的他者。

从内容层面看，历史书写追求事实，客观的、可见的事实，并据此对所涉及人物和事件作出评价。于是，当我们通过历史思维审视一个人的存在时，首要关注的是他完成的工作、取得的功绩，并自然地认为最重要的是现实结果、人不过是“他业绩的集合”^⑥。历史思维认为真理的基础应该是可见的、客观的事实，那些主观的、不可见之物，特别是一个人的内在生活、主体的内在性，其实很难真的实证，更无法准确复现，因此在历史书写者眼里就成了“虚无”，是历史书写需要回避的内容。^⑦可是，正是一个人的心灵活动，他看不见的内在性，他不可替代的独特感受，才保证了他存在的唯一性（unicity），使他无法被任何总体所吞噬。换言之，历史书写蕴含着这样的危险：独特的个体存在将被取消，变成可被计量之物，^⑧他将只是作为

^① Emmanuel Levinas, *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 5, 38.

^② Maurice Blanchot, *L'Espace Littéraire* (Paris: Gallimard, 1955), 23.

^③ Emmanuel 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191.

^④ Emmanuel Levinas, *Time and the Other*, trans. Richard A. Cohen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87), 99.

^⑤ Emmanuel 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191.

^⑥ *Ibid.*, 228, 298.

^⑦ *Ibid.*, 55.

^⑧ *Ibid.*, 58-9, 55.

历史不可抗力量的承载者出现，他的意义只能从历史这个总体中获得。^①

从价值判断层面看，历史思维总包含判断，甚至可以说审判，但这一评判的依据主要是行动的客观结果与业绩，而非行动者的主观意愿（will），也就是说在历史的审判中，被审判者的意愿是缺席的。而且历史的审判总是由幸存者做出，我们只能听到第三人称的陈述，没有发自死者“我”的第一人称的申辩。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基于可见性和普遍性的审判，对于主体性是不公和残忍的。^②

列维纳斯对历史思维的批判，解构了传统观念里历史话语在见证问题上享有的优势地位，暴露出历史话语隐藏的口吃与沉默，即总有什么逃逸于“历史之外”（beyond history），无法被历史的总体所囊括。^③这一“历史之外”或者列维纳斯所说的“本质之外”“别于存在”，是“客观事实”话语无力见证的，是《艰难时世》里“事实思维”的受害者葛擂硬太太临终竭力回想而不得，只能用“莫名其妙、毫无意义的花纹”勉力留下踪迹的“东西”，^④也是西丝（以及她所象征的文学）坚持用面向他者的“主观感性”话语加以回应的“东西”。尽管列维纳斯对文学艺术始终持有保留态度，^⑤但他破除了事实话语对于言说真理的垄断，揭示了第一人称主观感性经验的真理价值，为我们通过德里达探讨文学见证的独特价值打开了可能。

德里达的“见证诗学”

德里达两次集中探讨文学与见证之间的关系，一次是论述布朗肖的自传体叙事作品《我死亡的瞬间》（*L'Instant de Ma Mort*），另一次是分析策兰的诗歌《灰烬之光》（*Aschenglorie*）。^⑥他指出，文学是一直纠缠着见证的

^① Emmanuel 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22.

^② Ibid., 243.

^③ Ibid., 22.

^④ 狄更斯：《艰难时世》，第221页。

^⑤ Emmanuel Levinas, “La Réalité et son Ombre,” in *Les Imprévus de L'Histoire* (Paris: Fata Morgana, 1994), 107-127.

^⑥ Jacques Derrida, *Demeure: Fiction and Testimony*; Jacques Derrida, “‘A Self-Unsealing Poetic Text’: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Witnessing.”

编者絮语：列维纳斯、德里达与布朗肖：
历史沉默深处，或历史之外的见证

幽灵，所有见证都无法摆脱文学的“污染”。这个幽灵既威胁着见证的有效性，却也在同时确保了见证成为见证。换言之，文学与见证如影随形，相互成就，存在一种可称为“共可能性”（compossibility）的关系，且“所有负责的见证都包含对于语言的诗性体验”^①。

德里达从跨宗教、法律、哲学与文学的视角对二者间的“共可能性”进行了深入阐发。毕竟，见证是一种历史悠久、广泛存在于宗教领域和司法领域里的实践活动，只是在世俗化的、崇尚科学实证的现代，人们才将见证狭窄理解为仅仅是获取信息和提供证据的一种手段。德里达指出，应该把见证看成是一种行动，一种在人与真相或真理之间建立紧密关联的行动。^②用言语行动理论的话说，见证不仅包含表述维度（constative），即信息的传递，比如对亲历事件或场景的描述，一般可作出真假判断。见证还包含施行维度（performative），比如宣告并实践当事人或共同体的价值观，吁求审判，维护正义，建立信任以及坚定信念等等，会引发一系列复杂的伦理、政治和信仰结果。

某件事之所以需要见证，显然是因为我们已经走到了客观认知的尽头，在某个涉及真相的问题上，我们没有直接的、客观的证据，事件亲历者的见证因此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德里达指出，从这一角度说，事情的真相就像一个秘密，属于见证者的秘密，在“我”没有公开证言之前，其他人无从知晓。这个秘密只有“我”知道，我的证言是否属实，没有人有办法核实。因此，证言必然包含虚构的可能，也即文学的可能，必然包含真实与谎言间的不可决定性（undecidability）。^③换言之，秘密使见证成为可能，但同时也使文学的幽灵从一开始就出现在见证的内部。

见证渴望被倾听、被相信。因为，秘密只有被公开才能成为证言，而证言只有被接受为真实，它才能实现见证的目的。这一对于相信的渴求 is 过分的、苛刻的。因为，听众所面对的证言，无法用别的方式完全证实，他所面对的见证者永远处于诗人策兰所说的“没有人为见证者提供见

^① Jacques Derrida, “‘A Self-Unsealing Poetic Text’: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Witnessing,” 181.

^② Jacques Derrida, *Demeure: Fiction and Testimony*, 27.

^③ *Ibid.*, 30.

证”的绝境。^①换言之，证言哪怕是关于最普通、最日常的事件，它的核心也必然包含不可证明，乃至难以置信之处，就像是奇迹。相信奇迹，需要的不是简单的相信，而是一种称得上是信仰的跳跃。文学虚构渴求读者的，也是这种在不可证明时的相信，即文学术语所说的“对怀疑的悬置”（suspension of disbelief）。德里达指出，见证与文学的另一个连接点就是共通的奇迹性，以及接受奇迹性所必需的近乎“盲目”的相信，即信仰。^②

见证需要激情，一种亲身参与、树立乃至“制造真理/真相”（法：faire la vérité，英：making of the truth）的激情。^③而激情是一种失控经验，主体丧失了独立自主，失去了惯常的主导地位，向“我”之外的他者敞开。德里达指出，基督教将激情理解为承受，甚至受难是有道理的，^④见证不仅要背负忠实于真相的责任，还必须从此承受真相与谎言的不可决定性。见证者将不得不永远面对这一拷问：是真的还是假的，该相信还是不相信。然而，见证的激情不允许见证者停留于这一不可决定性，听任证言模棱两可、真假难辨。见证者渴望那不可能之物——对不可能的渴望正是激情的“本质”，即彻底弃绝真假的不可决定性，走向完全的真实。有时，见证者甚至为这一不可能性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即用生命展示证言的真实性，用死亡的决绝驱逐不可决定性的阴影。

在德里达看来，见证的激情也是文学的激情，或者说催生了见证的激情同时也催生了文学。^⑤这一激情是亲身“制造真相”的激情，更是守护和分享秘密的激情。文学追求独一性、不可替代性，所以一部文学作品的问世，如同证言的提出，是在分享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秘密。

对真相的公开并不必然构成见证。见证必须是一个具有强烈仪式性的

^① Paul Celan, "Aschenglorie," in *Atemwend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67), 68. 转引自 Jacques Derrida, "A Self-Unsealing Poetic Text":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Witnessing," 181.

^② Jacques Derrida, *Demeure: Fiction and Testimony*, 75.

^③ Jacques Derrida, *Demeure: Maurice Blanchot*, 26; 英文版参见 *Demeure: Fiction and Testimony*, 27.

^④ Jacques Derrida, *Demeure: Fiction and Testimony*, 26-27.

^⑤ *Ibid.*, 28-29.

编者絮语：列维纳斯、德里达与布朗肖：
历史沉默深处，或历史之外的见证

行动，这一仪式包含明显的或隐含的誓言，通过誓言，一个神圣的空间被打开，纽带被建立。见证者的誓言是一种许诺，向听众——在场的乃至未来的，向自我——我的良知，向高于自身的存在——法律、正义或者神许诺：“我要呈现真相。”无论见证者是否真心，这一许诺都将建立起具有约束性的纽带，将见证者与他者——包括听众以及某种视为神圣的存在——联系起来，并置于后者的裁判之下。如德里达所说，见证者的“誓言标志着对神圣的接受，并建立起与他者的关系，这一关系是一个神圣的空间”^①。

德里达没有提到，其实与见证相似，文学在言说之前也要“宣誓”。它的“誓言”或者说“忏悔”是：“我要说的不是真的。”这是文学为获得“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特权，也即“诗性的特权”（poetic license），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这种“言说一切”的特权再加上文学令人信以为真的强大力量，只会使它变成最危险的言说。所以，文学在“撒谎”前的坦白，反而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承担起自己不负责任的责任，与见证前的誓言一样，表达了对法、审判和正义的敬畏。尽管文学因为致力于虚构，放弃了直接言说真相的权利，但也正因为这一放弃，得以与见证一道共同守护着真相。

见证强调在场，即事件发生时要亲身经历，作证时要亲自登场。这种对在场的强调包含着强烈的时间意识，突出的是见证（包括经历与作证）的当下性、独一性和绝对性，即就在那一刻的独一经验，不可复制，无法挽回。悖谬的是，所谓见证，就是在提出证言的现在“重演”事件发生时的现在，同时准备在将来重复这一“重演”。或者说，见证就是对不可重复的独一经验的重复。^②

其实，见证中独一与重复之间的悖论同样出现在文学阅读经验当中。对于读者来说，无论文学作品是否使用过去时态，无论作品如何具有鲜活的当下感，在逻辑上作品虚构的事件并不发生在阅读的同时，而是总是已经发生了，发生于阅读之前。^③ 读者作为听众，听到的是作品对于过去事件的证

^① Jacques Derrida, "A Self-Unsealing Poetic Text":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Witnessing," 194.

^② Jacques Derrida, *Demeure: Fiction and Testimony*, 32-33. Bob Plant, "On Testimony, Sincerity and Truth," *Paragraph* 30, no.1 (2007): 30-50.

^③ Jacques Derrida, *Demeure: Fiction and Testimony*, 91-92.

言，而没有进入事件的当下。对过去事件的亲身经历是独一的，作品作为对这一经历的证言也是独一的，但作品又是可以在将来被反复阅读和普遍欣赏的。只是，作品中的“空白”和“间隙”时刻提醒着读者，作品只是证言，而非那个秘密本身，哪怕在被证言分享之后，那个过去的事件仍然保留着它的神秘性。

通过德里达，我们发现见证与文学紧密相连，二者之间具有一种源发性的“共可能性关系”，而非非表面上的矛盾对立。秘密、信仰、激情、誓言以及独一性是这一复杂关系的连接点。围绕着真相，见证和文学相伴相生，接壤、渗透又分疏，一方面相互映射、彼此摹仿，另一方面相互诘难、彼此侵扰。

布朗肖论遗忘与文学

现在，我们要通过布朗肖继续追问，文学见证什么，又如何见证？

布朗肖的回答是，文学见证的是“无法经验、不可承受之物（le non-éprouvé）”，同时这一见证也是在建立与“无法记忆之物”的联系。^①一般来说，见证的基础是对真相的记忆，而布朗肖却提出文学的见证来自遗忘，“诗人言说时，仿佛在回忆什么，但如果他在回忆，那也是通过遗忘”。^②要理解这一点，需要梳理布朗肖如何看待遗忘、记忆和文学三者之间的关系。^③

通常认为，记忆与遗忘之间，记忆不仅先于遗忘，还优于遗忘。的确，记忆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它给我们一种印象，那已经不在场之物在意识的捕捉下仍然可以在场（presence），并可以在任何时候被从过去带回现在（present），得以被重新呈现（representable）。而遗忘则是记忆的抹除或者缺失，即以记忆为基础，多数时候与冷漠、疏忽、压抑、衰老或疾病等负面经验相连，哪怕是在少数正面经验中，比如宽恕、豁达，遗忘的积极性其实

^① Maurice Blanchot, *L'Écriture du Désastre*, 186.

^② Maurice Blanchot, *L'Entretien Infini* (Paris: Gallimard, 1969), 464.

^③ 这里只能扼要介绍，因为要想全面阐明布朗肖对于该问题复杂丰富的论述，本文的篇幅是不够的。

也是以记忆为前提。

布朗肖指出，遗忘其实包含两个层面，一面服务于记忆，与它构成对立统一关系，另一面则在记忆与遗忘的辩证法之外。这是经常被传统看法忽视的一面，但反而是更为根本的一面。

这一面不是记忆的丧失，或者口语中所说的“记不得了”，而是从一开始就“记不住”，或者说，意识遭遇了“无法记忆”的东西，没有办法认知、把握和保留它。这是记忆在根本意义上的不可能，是无法被任何科学技术的发明所改变的不可能，尽管人类一直在不断增强记忆的能力，从文字书写到音频、视频的录制。因为总有什么从未进入、也不会进入意识所能经验的现在，从未成为、也不会成为在场，因而在严格的意义上说，永远无法被呈现，比如死亡本身这一不可经验的“经验”，比如他者的绝对他异性，如布朗肖所说：“那没有现在之物，也不会接受记忆的现在。”^①

因为意识警觉到有什么逃逸出了它的把握，它存留不住，记不住，所以它才想要极力阻止和挽救，去记忆，去制造曾在场且仍在场的假象。^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布朗肖提出，遗忘不仅先于记忆，而且是记忆的本质，“遗忘是太阳，记忆通过反射遗忘而发光，记忆汲取的是遗忘的光线”。^③

布朗肖不仅解构了记忆的在先性，还解构了它在价值上的优越性。他提醒我们，记忆包含着一个危险的悖论。遗忘，或者说对遗忘的意识，或者仅仅是对遗忘的怀疑，都会令人不安，仿佛我们一直亏欠着什么，又非常苦恼的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隐约中某个来自过去的声音在不停呼唤，要求我们回应。因为无法记忆（immémorable），所以在记忆之外、无法追忆（immémorial），^④所以令人忐忑、又无法摆脱。而记忆相反，它让人安心。因为凭借记忆“这种活跃的力量”，我们“可以自由地召唤过去，并根据现在的意图处置它”。^⑤凭借记忆，我们自信已经征服了过去，一切都已变成现在，至少在记忆的裁判之

^① Maurice Blanchot, *L'Espace Littéraire*, 21.

^② Aïcha Liviana Messina, "Friendship," in *Understanding Blanchot, Understanding Modernism*, ed. Christopher Langlois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8), 321.

^③ Maurice Blanchot, *L'Entretien Infini*, 460.

^④ 参见Maurice Blanchot, *L'Écriture du Désastre*, 15, 10.

^⑤ Maurice Blanchot, *L'Espace Littéraire*, 21.

后，过去有价值的一切都已保留。现在我们不再苦恼于过去的一去不返，因此摆脱了无法承受的对于过去的亏欠感，也不再受制于那无尽呼告的牵绊。就这样，记忆最终变成了对过去的摆脱、挪用和背叛。^①

布朗肖所说的“无法记忆之物”，也被他称为“无法经验/不可承受之物”或“非经验的经验”（non-expérience）。^② 布朗肖有意调用了法语动词“éprouver”原本就相关的多重含义：检验，感觉，体验，承受，遭受等。他敏锐地指出，“无法经验/不可承受之物”的关键在于，当它到来时，没有主体在场，或者更准确地说，任何主体都经受不住、幸存不了，因此它永远没有现在，也无法被呈现。严格地说，它不能被任何主体真正感受和承受，因此也无法被检验和证明。^③

换言之，对于无法记忆之物，我们无法认识，更无法把握，只会有一种“似曾相识但并不认识”的恍惚感，一种“它并不存在，只是再次到来，已经到来，又总是已然逝去”的梦幻感，^④ 一种可能已经遗忘的怀疑。^⑤ 但是，这一对于遗忘的担心，无法确证的疑虑，反而是对不可记忆之物最忠诚的见证：“遗忘，【是】对不可追忆者的记忆，【这一记忆同时也是】没有记忆。”^⑥

布朗肖认为，文学与遗忘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亲缘”关系。理解这一关系，我们可以先从“书写”这一概念入手。在日常观念里，记忆往往被类比为一种书写，在心（意识）中写下现实的经历，遗忘则是对所留记录的涂抹或删除。记忆的目标和语言文字一样，忠实替代现实存在。受黑格尔启发，布朗肖认为，记忆/语言文字的这种神奇力量来自于人能够否定，即用记忆/语言文字否定（代替）每个独一的存在者，从而获得存在者的存在（表现为观念和意义），并进而认识和建构世界。^⑦ 但在根本的遗忘中，正如在文学书写中一样，否定变成了一种对自身的否定，一种不再有效（inopérant），不再做功

^① Maurice Blanchot, *L'Espace Littéraire*, 21.

^② 参见Maurice Blanchot, *L'Écriture du Désastre*, 85.

^③ Ibid., 163.

^④ Maurice Blanchot, *L'Espace Littéraire*, 21.

^⑤ Aïcha Liviana Messina, “Friendship,” 321.

^⑥ Maurice Blanchot, *L'Écriture du Désastre*, 163.

^⑦ Maurice Blanchot, *La Part du Feu* (Paris: Gallimard, 1949), 311-314.

编者絮语：列维纳斯、德里达与布朗肖：
历史沉默深处，或历史之外的见证

(désœuvrement)，不再作为主体力量来源的否定。^①此时的遗忘，正如对语言的暴力基础充满不安的文学语言一样，^②不再作为一种可能性服务于记忆的辩证法，不再对记忆-书写背后难以挽回的消逝视而不见，而是让消逝本身显现，仿佛俄耳甫斯在离开冥府前投向欧律狄刻的那一瞥，指向那些“从未发生/拥有位置 (avoir lieu)、未来也无法在任何一个现在找到位置”的东西。^③

对布朗肖来说，文学就是一种遗忘。的确，在文学的阅读、写作过程中，我们需要抽离这个世界，沉浸在虚构的空间，也就是说要遗忘现实。在布朗肖看来，其中的关键在于，文学所造成的遗忘，或者说使我们承受的“遗忘的狂热”，^④就像一场灾异，将拆解我们与世界之间所建立的在场或缺席的关系，^⑤而使我们置身于一个幽灵出没的空间。在这里，一切既非纯粹的在场，也非纯粹的不在场，而是一种幽灵性的“在场”。换言之，文学空间里的人物、情感等等一切的确是一种显现，是一种在场，但它们其实并不显现于任何一个现在。或者说，它们的在场“摆脱了一切现在，与存在没有关系”。^⑥当这些幽灵出现时，它们总是已经在消失，总是将要出现，换言之，它们只有过去和未来，而没有现在。所以，我们永远无法和幽灵构成同时关系，无法和它们共在场，也因此它们“逃离了我们的掌控，摧毁了我们处置它的力量”。^⑦幽灵没有现在，所以困于永恒轮回中，“它从未发生，从未第一次发生，但它总是重新开始，无限地开始”^⑧。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布朗肖强调，文学作为遗忘其实使我们置于一种极端的被动之中，它“指示了超越可能性的东西，无法被忘记的他者，指示了不论过去还是未来它都无法限定之物：耐心的被动性”^⑨。这一承受遗忘的耐心，也是对见证充满期待的耐心，将把我们带向“非历史的时间，所有时

^① Maurice Blanchot, *L'Écriture du Désastre*, 135, 182.

^② Maurice Blanchot, *La Part du Feu*, 315.

^③ Ibid., 135.

^④ Ibid., 12.

^⑤ Maurice Blanchot, *L'Écriture du Désastre*, 184.

^⑥ Maurice Blanchot, *L'Attente L'Oubli* (Paris: Gallimard, 1962), 78-79.

^⑦ Maurice Blanchot, *L'Entretien Infini*, 461.

^⑧ Maurice Blanchot, *L'Espace Littéraire*, 21.

^⑨ Ibid., 180.

间的他者”。^①

结 语

本文以二战后见证文学的兴起为引，通过整合列维纳斯、德里达和布朗肖彼此相通但各有侧重的相关论述，试图回答：历史的见证遭遇了怎样的危机，文学对于见证为什么是不可或缺的，文学如何见证，以及文学见证什么。三位思想家中，列维纳斯对历史思维和历史话语的批判，对其他两位尤其布朗肖来说是奠基性的。可以看出，布朗肖在阐发文学见证的独特价值时，“在历史之外”是一个很重要的切入角度。列维纳斯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关注，深刻影响了德里达和布朗肖，尤其他提出的，见证最重要的是见证关于他者的真理，而非意识与存在的符合，“在意识产生之前的对他者的责任是一种最原初的见证，见证了不可呈现的无限”。^②德里达在分析见证与文学之间密切关联时，对在场形而上学的解构，对承受激情之被动性的强调，都与布朗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最终，我们在布朗肖的论述中发现，文学通过一种根本性的遗忘，在历史之外，在历史保持沉默处，成为“对记忆的警惕，一种守护力量”，^③“就像是守夜，就像是给人灵感的失眠，当一切都已经被说完，还会听到‘言说’，听到最后一个见证者的证言被宣告”^④。

特邀执行主编简介：

汪海，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guest editor

WANG Hai,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hai.wang@ruc.edu.cn

^① Maurice Blanchot, *L'Écriture du Désastre*, 134.

^② Adriaan T. Peperzak, "Truth of Disclosure and Truth of Testimony," in *Basic Philosophical Writings*, eds. Adriaan T. Peperzak and Simon Critchley and Robert Bernasconi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97.

^③ Maurice Blanchot, *L'Entretien Infini*, 460.

^④ Maurice Blanchot, *L'Écriture du Désastre*, 158.